

苏州青少年法治教育精神谱系		
时期	代表人物或事件	体现的法治精神
古代苏州	言偃（公元前506—前443年）	以礼乐为教，依据夏商周典章制度，通过唱诗、弹琴等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法律知识，营造家喻户晓的氛围，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， 自觉规范个人行为 and 遵守社会公德 。
	范仲淹（989年—1052年）	900多年前，范仲淹捐出自购好地首创府学，成就“东南学宫之首”，为昔日“状元之乡”、今日“院士之城”打下基础。从此，苏州城头翻涌的不仅是太湖的云气，更是一个民族 重教兴学 的精神图腾。这个民族最深沉的风骨，将永远在琅琅书声中赓续传承。
	况钟（1383—1443年） 钱岱（1539-1620年） 冯梦龙（1574年-1646年）	“法律是治国之重器，良法是善治之前提”，在苏州古代长期的法律实践中， 廉政制度建设与机构建设相结合、惩罚规定与防范措施相结合、法制规范与道德导向相结合 ，构成了廉政法律文化的主要特征，涌现出况钟、钱岱、冯梦龙等一批清正廉洁、奉公为民的好官吏。
	顾炎武（1613-1682）	顾炎武最广为人知的主张，即反对“独治”，主张“众治”，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也蕴含“众治”的细想，这与全面依法治国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。其“正人心”和“厚风俗”的法治思想，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，体现 法律与道德紧密结合 。
近代苏州	李超琼（1864-1909）	李公堤，在金鸡湖西南水巷邻里东，已然成为苏州的时代地标。提及李公堤，人们自然会想起发起修筑这条长堤的李超琼。他爱民、亲民，注重为民办实事，深受人民爱戴，秉持倡廉去私、守法奉公的理念，体现出一 身正气、廉政爱民 的伟大精神。
	1936年12月4日“七君子事件”	1936年12月4日，一支囚车车队缓缓驶抵。囚车中的七名囚犯分别叫沈钧儒、李公朴、沙千里、史良、王造时、章乃器、邹韬奋，均是名满天下的风云人物。在一个民权不彰的时代，他们竟因爱国、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，而被反动当局冠以“危害民国”的罪名锒铛入狱，史称“七君子事件”。而就在半年前，国民政府刚刚颁布所谓的“中华民国宪法草案”，宣称 人民享有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等自由 。“七君子事件”引起了举国舆论的强烈反弹。1939年2月，江苏高等法院终于撤销起诉，承认“七君子”爱国无罪。
	宪法的苏州记忆	苏州人对 中国民主宪政之路的探索和影响 ，可一直追溯到清末洋务运动时期。从清末立宪运动思想先导冯桂芬、“中国新闻报纸之父”王韬、到参与《共同纲领》和“五四宪法”制定的沈钧儒、“五四宪法”语文顾问叶圣陶、“八二宪法”具体起草负责人胡绳等，一代代苏州人所做的救亡图存的努力、制宪立宪的探索、民权民主的斗争，纵然走过许多弯路，经受过许多彷徨，最终都未曾虚掷。
现代苏州	苏州地方立法实践	1993年4月22日，国务院批复同意苏州为“较大的市”，苏州市自此获得地方立法权。30年来，苏州市坚持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，及时制定土地管理、道路交通管理、外商投资企业管理、经济开发区管理、外来人口管理等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，以“小切口”立法快速 填补改革发展急需的法律空白 ，围绕历史文化城保护、生态环境保护、社保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提供立法保障，坚持体现 “立法为民” ，把人民利益、人民意愿、人民权益、人民福祉落实到地方立法全过程。
	渔民号子法治新篇	渔业是苏州太仓市的传统产业，有众多以长江捕捞、海上捕捞为生的渔民。自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及《长江保护法》实施以来，渔民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，离船上岸，由退捕政策铺路在各行各业继续发光发热。他们离船不离江，致力保护长江生态，谱写长江大保护新篇章；他们积极加入法律明白人队伍，活跃在基层法治一线，既成为非遗文化的传承者，也成为 法治宣传教育的传播者 。
	“吃讲茶”援法议事	“吃讲茶”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习俗，用于解决民间纠纷。光阴荏苒，如今的苏州古镇依旧保留着“吃讲茶”文化，当年的“中间人”变成了老党员、人民调解员、社区民警和法律顾问， 调解时不仅讲理，更讲“法” 。同时，“吃讲茶”场所也兼具社区服务和居民议事功能，古老的“吃讲茶”文化在孕育它的土地上焕发出新的活力。
